

20世纪俄罗斯

档案文件

新经济政策
是怎样被断送的

(一)

新经济政策是怎样被断送的

1928—1929年联共（布）中央全会速记记录
（五卷本）

- 第一卷 1928年4月6—11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
第二卷 1928年7月4—12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会
第三卷 1928年11月16—24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会
第四卷 1929年4月16—23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
第五卷 1929年11月10—17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会

第一卷

1928年4月6—11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
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

РОССИЯ XX ВЕК

ДОКУМЕНТЫ

Как ломали нэп.

Стенограммы пленумов ЦК ВКП(б) 1928—1929 гг.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фонд «демократия»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атерик»

©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фонд «Демократия» (Фонд Александра Н. Яковлева), 2000.

© Данилов В. П., Муравьева Н. В., Сидоров Н. А., Хлевнюк О. В. Составление, введения, примечания.

本书中文版权取得俄罗斯国际民主基金会授权,由人民出版社独家出版。

图字:01-2007-0782号

责任编辑:魏 华

装帧设计:曹 春

版式设计:马 杰 责任校对:湖 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经济政策是怎样被断送的(一)/[俄]A. H. 雅科夫列夫 主编 李方仲

宋锦海 李永庆 译 李方仲 校.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12

(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A. H. 雅科夫列夫院士 主编)

ISBN 978-7-01-006355-3

I. 新… II. ①雅… ②李… ③宋… ④李… III. 经济政策-研究-俄罗斯
IV. F15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15110 号

新经济政策是怎样被断送的(一)

XIN JINGJI ZHENGCE SHI ZENYANG BEI DUANSONG DE

[俄]A. H. 雅科夫列夫 主编 李方仲 宋锦海 李永庆 译 李方仲 校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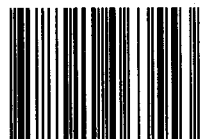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36.5

字数:66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06355-3



9 787010 063553 >

ISBN 978-7-01-006355-3 定价:8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内部发行)

本卷编辑出版委员会：

В. П. 丹尼洛夫 О. В. 赫列夫纽克 А. Ю. 瓦特林 (以上为主编)

М. С. 阿斯塔霍娃 Г. В. 戈尔斯卡娅 И. М. 扎科莫尔基娜

Е. Е. 基里洛娃 Л. П. 科舍廖娃 В. С. 列瓦诺维奇

Л. Н. 马拉申科 Н. В. 穆拉维约娃 Л. А. 罗戈娃娅

Н. А. 西多罗夫

李方仲 宋锦海 李永庆 译

李方仲 校

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

主编

A. H. 雅科夫列夫院士

编辑委员会：

A. H. 雅科夫列夫（主任）

E. T. 盖达尔, B. П. 科兹洛夫, B. A. 马尔丁诺夫,
C. B. 米罗年科, B. П. 纳乌莫夫, E. M. 普里马科夫,
A. H. 萨哈罗夫, Г. H. 谢沃斯季亚诺夫, H. Г. 托米林娜,
C. A. 菲拉托夫, A. O. 丘巴良, A. A. 雅科夫列夫

卷 首 语

《20 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是迄今为止,俄罗斯整理出版的规模最大的历史文献集。收录的大部分文献,都是首次对外公布,内容贯穿俄罗斯 20 世纪特别是整个苏联时期的历史,涉及许多重大问题和历史事件,史料价值极高。

2001 年春,我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期间,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同志向我建议翻译出版此书,我表示赞成,并担任了翻译出版委员会主任。六载寒暑一挥间,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人民出版社及翻译出版委员会的同志,为本书的按期译成出版,承担了相当繁重的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本书的译者,多为我国著名学者和翻译家,正是他们经年的认真严谨工作,才使我们尽可能准确、全面地了解这部文献的内容。在此,我对他们创造性的劳动和严谨的治学态度,表示崇高的敬意!

苏联史,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史;是人类第一次探索、寻求自身解放,实现人民国家的历史;是人类的极为宝贵的经验、史诗。人类这部遗产必须记取,并深入反复研究。

十月革命是人类发展史上最响亮的一声号角,洞开了人类的眼界,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当然,这个历史探索是充满曲折、艰难、复杂,甚至严重的挫折或一时的失败。苏联在建立后 69 年解体了,倒下去了,但历史永存、精神永存!道不亡,理不失,历史将按自己的规律、道路走下去。潺潺细流,终将千回万转夺路归大海,这是自然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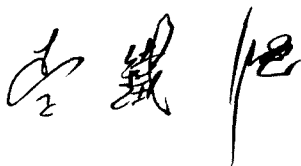
历史学是一门人文科学,研究历史资料,要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不拔高一寸,不贬低一分,不涂抹一笔,不杜撰一字。只有这样,才能继承这笔精神遗产,把苏联史作为当代史来研究。

中国是史学大国,《史记》、《资治通鉴》等都是其经典著作。这些史学巨著为中华民族的传承提供了巨大的精神财富和脉络渊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目的都是要实现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不仅是中国,也是人类发展的伟大探索。在这一历史探索过程中,汲取人类的历史遗产,包括苏联的社会主义历史经验,是必须的,也是走向未来的历史起点。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和创造者!善学善为者史存焉!

史料是人类认识历史和研究历史的基础。这部具有重大研究价值的文献集,将为我国对俄罗斯特别是苏联历史的研究提供大量新鲜史料。但是,任何史料都会因编者的立场观点而存在局限性和倾向性,因此,在使用这些文献资料时,要对之加以分析和鉴别。

我建议这部史学巨著的翻译出版工作继续进行下去。

斯为馨香以祝之!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consisting of three stylized characters: '李', '锐', and '旦'.

2007 年 9 月 30 日

总 序

1928—1929 年的联共(布) 中央委员会全会速记记录： 结合时代的历史原始资料

这次出版的 1928—1929 年举行的所有 5 次联共(布)中央全会速记报告,在很大程度上回答了一个问题,即新经济政策是怎样被断送的。传统上称为“新经济政策”的现象实际上不仅仅是一个执政党在党的会议上决定其命运的政策,而且是一种特别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模式,既不同于原先的“战时共产主义”的战时动员体制,也不同于后来在新经济政策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斯大林体制。

世界大战和随后的国内战争持续了 7 年,从 1914 年夏天到 1921 年春天,在这之后,取代了“战时共产主义”的新经济政策事实上是国家摆脱经济崩溃惟一可能的条件。

俄罗斯不可避免地把战争的所有重担转移到了农民经济的身上——动员劳动能力最旺盛的男子参军,向国家提供食品(实际上是无偿的,所以也就是导致破产的)。从战争一开始,这两件事就都落到了农民的肩上。1916 年末,沙皇政府不得不采用了粮食征集制,也就是把国家对粮食的需求摊派给各个农户,作为无论实际条件如何都必须承担的贡赋。虽然最初粮食的征集规模只限于满足军队的需要,但是征集时也需要有“粮食军”。二月革命建立的临时政府不仅保留了粮食征集制,而且在 1917 年 3 月就已经推行了对粮食的国家垄断。布尔什维克企图按照“战时共产主义”的方式着手组织社会的活动,从而使得征集制带有了普遍性——它已经从粮食征集变成了由“食品大军”进行的食物征集。

征集制从农民那里拿走了他生产的所有“剩余”产品,保证了社会能半饥半饱地生存,但是同时也就无望走出食品危机了。征集制否认农民有支配自己劳

动果实的权利,也就堵塞了提高农业生产的条件,不可避免地引起农村越来越强烈的反抗。典型的状况是,农民要求取消粮食征集制在 1920—1921 年形成了一个明确的公式:“我就给这么多,然后就该我做主了。”(后话先说,要指出的是,1927 年末至 1928 年初斯大林的“紧急状态”就是从否定种粮食的农民对他们生产的产品拥有所有权开始的。)

起初,新经济政策被理解为是对农民的“小资产阶级自发性的让步”,而且只限于地方的商品交换,但是很快大多数领导人就承认了必须“根本改变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而且要让国家相应地通过居民的自主合作转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的社会体制。合作制成为了新经济政策的决定性因素。列宁写道,“不应该让合作社去适应新经济政策,而应该让新经济政策去适应合作社。”¹

对于全国,尤其是对于农村来说,由于战争的破坏和 1921—1922 年的饥荒,向新经济政策过渡在很大程度上变得复杂了。在伏尔加河沿岸地区、顿河和乌克兰,农村里的饥荒持续到了 1923 年和 1924 年。就全国来说,应该承认,只是在 1925—1927 年,农村才实行了新经济政策——没有了强制性的粮食征集和饥饿。但是即便认为新经济政策是从 1921 年春天开始的,那也不能不承认,要让新经济政策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和囊括全部的经济体制,这段时间也太短了。就是这样短的时期,也已经相当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新经济政策是有能力通过发展市场关系把国家一切现有的生产力动员起来,保障整个经济的高涨。

新经济政策首先保障了农业生产的恢复。考虑到小农经济已经奄奄一息,牲畜作为基本的役力有很大损失,在很大程度上还需要靠天吃饭,这个进程不可能是很迅速的和全面铺开的。同时工业、交通受到了破坏,必须恢复,还要重新振兴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这都需要大量资金,也只能在世界市场上用粮食、木材和原料进行交换来获得这些资金。

刚一有了可能,(在 1923 年)粮食的出口就恢复了,而且这马上就成为进一步为工业积累投资的主要来源。由于这个缘故,就是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粮食收购问题也仍然是农村和国家关系体系中的中心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领导制定的计划往往超出现实的出口可能。在 1925 年 12 月的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有许多议论,按 Л. Б. 加米涅夫的说法就是“老乡调整了”我们,也就是说,从 1925 年的收成中收购粮食的计划有各种失算。这些计划显然过高了:“给我们矫正了 2 亿普特”。结果对工业的投资从 11 亿卢布降到了 7 亿—8 亿卢布,——“整个速度不得不降下来”。²怎么办呢?修正了计划,但是

既没有改变整个经济政策,也没有改变在农村征集粮食的制度。1926年有了比较高的收成,保障了扩大粮食出口和工业的增长“速度”。

但是,事情还不仅是要调整计划适应现实的条件。追究了中央统计局的责任——责怪的不是夸大而是缩小了生产的可能条件,从而也就缩小了国家收购粮食的条件。1925年12月1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了“中央统计局平衡粮食饲料的工作”,党的最高领导狠批了П. И. 波波夫的活动,他是著名的地方统计官员,从1918年起就在领导中央统计局。И. В. 斯大林和他的支持者们定了调子。通过的决议说,“中央统计局及其领导人波波夫同志在编制粮食饲料平衡表时犯有重大错误,无论是断定商品粮食的多少,还是粮食的余富和不足,或者断定农民各基本阶层的经济关系,这个平衡表都不足以为凭”。П. И. 波波夫和斯大林直接争吵起来,他坚持说,粮食生产达到的指标并不高,富农没有大量的粮食储备,于是当天就被撤销了中央统计局的领导职务。³

我们是有意提到1925年12月撤换中央统计局领导人这个情节的,因为从这时开始,这个局就完全为政治所左右了,提供的都是它认为合适的信息,其中也包括在断送新经济政策中起了不小作用的信息。两年之后,出现了1927—1928农业年度的粮食饲料平衡表,它大大夸大了农民的粮食储备,而且成为了“非常”粮食收购的依据。

本卷公布了联共(布)中央(1928年)四月全会的材料,我们在它的导言里专门谈到这个问题。在这里要指出的是,任何经济统计指标,无论是真是假,都不可能为政治领导的行动做出解释,更不可能成为对它的辩解。在1927—1928年的具体情况下,无论如何估量农民的粮食储备,评价他们是不是合理使用了粮食,都绝不可能得出必然的结论,说是应该放弃新经济政策或者建立官僚主义专制。至今还被指责是“左倾激进主义”的联合反对派和Л. Д. 托洛茨基一起,也曾向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建议,说是应该采取措施利用积存起来的储备,但是要在新经济政策的范围内。它也是从中央统计局的这个粮食饲料平衡表出发,认为合理的做法是,以借债的形式^①,“保障从富裕的富农阶层,也就是大体上10%的农户那里,由在1926—1927年已经达到的8亿—9亿普特并且大部分集中在农民上层手里的实物粮食储备中,征收不少于1.5亿普特”的粮食⁴。也曾有人建议把这些粮食运到国外市场上去,采购工业设备,从而加速工业化进程,逐渐地随着新企业的投产,将产品用于满足农村需求,这样来逐渐偿还强制性的

① 斜体是作者标记的,下同。——译者注

借债。

从1927年秋开始,农村局势戏剧性地展开了,粮食因素在其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借助统计上的夸大建立起来的粮食充裕的神话应该能让政权当局相信,有可能得到这样数量的粮食,最终保证为加速工业化和巩固国防等等解决资金问题……

同时,斯大林领导层应该能让党和国家的上层相信,必须落实这些条件并且采用一切手段从农民那里拿到足够数量的粮食,解决“例行的任务”。“外部危险”和“战争的直接威胁”都能成为久经考验的理由,为这种政策效劳。苏联和英国以及中国的相互关系中发生过冲突,但绝没有包含军事威胁的成分,可是在1927年却被没有任何限度地利用了,当然是为了证明,不仅在推行粮食征集制时,而且在更大程度为了把政权集中在斯大林的手里和消灭任何反对派,都必须采取“非常措施”⁵。

人们已经普遍不满,斯大林领导层不得不放弃加剧战争心理的做法,但是它的“痕迹”却不可能在短期内自行消失——国家对1914—1920年的战争灾难还记忆犹新。从1927年12月最后几天到1928年1月初出现的“粮食收购战线”上的“紧急状况”达到了意外的炽热程度,立刻就让人想起了不久前的宣传运动并且影响到农民的所作所为。正像1928年1月7日联共(布)西伯利亚边疆区委发给所有区委的关于粮食收购问题的电报中所证实的,“农民确信近期内将不可避免地发生战争,这是推行粮食收购的一大障碍……必须想方设法加强动员工作和在若干年内连续进行其他方面的准备,让农民树立起信心,认识到在最近的将来,只要加强国家的经济威力,就完全可以指望进行和平建设。必须停止赤裸裸地宣传战争危险和各种进犯随时可能来临的做法”⁶。

我们面对的是斯大林领导层(而且遗憾的是,不仅是斯大林领导层)的典型做法:为解决一时任务而人为制造了一种局面,结果是它成为了达到真正重要目标的障碍。解决矛盾靠的是对千百万人的暴力。上面引用的电报是由С. И. 瑟尔佐夫签发的,他是一个不惜采用暴力的人,但是同时他又能够做到把在解决最主要的任务时人为地增加困难的政策称为“不聪明的”政策。他成为了还在1930年就已经组建起来的第三个反斯大林的反对派首领,这不是偶然的。

联合反对派被开除出党也被推迟到了1927年10月的中央和中央监委全会和12月党的十五大时(首先是布哈林集团的抵制),这也约束了斯大林的追求。斯大林没有能在1927年按照他计划的规模开展大规模的迫害。他没有敢马上就改变粮食收购政策。早在收购运动一开始时就已经清楚了,中央统计

局的专家委员会确定的粮食总产量是43.5亿普特——“比去年多2500万普特”。当然,4种主要作物——黑麦、小麦、大麦和燕麦的价格,从1926—1927年度的每普特85—90戈比提高到了1927—1928年度的90—95戈比。⁷实际上9月份价格就降低了3%—5%,有些地方还更低。

这里指出的粮食价格政策中的摇摆反映出了1927年秋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中的斗争,这是需要特别研究的,因为正是在当时,新经济政策何去何从已经有了疑问。1927年9月1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决定要求在各种作物和地区之间确定“更适应的价格”,事实上导致了降低价格,这事实上是要撤销粮食价格问题。在这个决定中,特别有意思的有两点:一点是商业人民委员部的建议,经过Я.Э.鲁祖塔克和А.И.米高扬的校改后,它们应该变成政治局的决议;还有一点是建立“审议商业人民委员部收购原料和粮食权力”的委员会,在那里起主要作用的又是鲁祖塔克和米高扬。⁸这些文件还需要继续查找。

总的来说,几乎到12月底,粮食收购领域里的斯大林政策的特点是,决定和行动都是预备性的和隐蔽的。鲁祖塔克和米高扬根据政治局9月15日的委托准备的《关于1927—1928年度粮食收购决议草案》,直到11月24日(经过了13次会议之后!)才列入政治局的议事日程,决定非常短——“推迟”。在后来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11月30日),决定依然如此……⁹以后还要开联共(布)十五大,斯大林没有敢于着手进行在9月就已经确定的那些行动。在代表大会上(1927年12月2—19日),斯大林领导层伪善地扮演了维护新经济政策、反对“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的角色。代表大会开除的不仅有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而且还有反对派的所有积极活动的人,这次胜利使得斯大林能够放手开始断送新经济政策和大刀阔斧地用命令迫害的办法解决全部社会和经济问题了。在20年代,还可以把它们称为“战时共产主义”的办法,也还可以把它们和新的战争威胁联系在一起,因为斯大林主义这种现象本身还没有足够完整和独立地暴露出来。但是,这里的相似是形式上的,而且可以归结为国家粮食收购的征集制,就像已经提到过的,这种办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就已经采用了。斯大林的迫害体系从一开始就具有了更大的广泛性,实际上是包罗万象的,特别是在农村,因为国家人力和物资资源的基本部分都集中在了那里。

1927年12月22日,在十五大上选出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第一次会议上,就做出了决定:“定于明天,12月23日上午11点举行政治局非例行会议,讨论粮食收购和粮食出口问题”。¹⁰这次政治局会议(附件2)成立了委员会,要通过交换意见制定《关于粮食收购的决议草案》,《中央给地方党组织的……指令

草案》，还要确定“派往地方”的粮食收购全权代表的组成。¹¹12月24日通过了所有上述文件。但是1928年1月5日和14日出现了同样是关于粮食收购问题的新指令，把国家推向了“紧急状况”的道路。所有上述指令以及与之配套的基本文件今天都已经发表了。¹²所以，我们也就只限于评述一下这些文件中的主要一个——1928年1月5日政治局通过并于1月6日以联共（布）中央的名义、由斯大林签发的指令的内容和调子的特点了。

在这个指令中，摆在首位的是纯粹行政性的要求：“地方组织的工作速度缓慢得不能容忍，还在处于冬眠状态，基层机构还没有动起来……政权和党的杠杆还没有启动……农民共产党员、苏维埃和合作社积极分子没有把自己所有余粮都卖出来，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也没有把所有商品粮都运出来。所有这些正像已经证实的那样，证明地方组织忘记了‘对党和无产阶级承担的基本义务’”。指令要求“在一个星期的期限内做到粮食收购的决定性转折……而且无论是提出什么借口或者拿节日做理由，中央都将认为是在粗暴违反党的纪律”。

规定地方上的党组织要“坚决完成商业人民委员部的年度和月度任务”，它的所有“日常指令，不得迟缓”，“……最严格地准确按时完成”。为了“从农村汲取货币积累”，建议“规定期限，让农民最大限度地加速向国库支付所有的一切……争取提前交付所有的付款……依据捐献的法律快速确定对地方的额外征税”等等。最后，“在征收各种付款的欠款时要立即采取严厉的惩罚，首先是对富农（这也就是说不是只对富农！——作者注）。需要对富农和破坏农业价格的投机分子采取特别的镇压措施”。接着就是要求“立即动员”党组织“所有优秀力量”；对各级组织“领导人规定个人责任”，“立即清除他们中间那些显然对争取成功无能为力的人”……指令在末尾严厉警告说，“如果拖延完成这个指令和在一个星期的期限内（！）不能取得实际成果，坚决扭转粮食收购状况，中央可能就不得不更换目前的党组织领导人了”。¹³

这第一个纯粹斯大林式的关于粮食收购的指令事实上阐述了一种全新的对待农民、断送新经济政策和在农村广泛采用镇压手段的纲领。1928年1月，针对粮食收购实施了1926年通过的俄联邦刑事法典的镇压条款：针对私人收购人投机的第107条；针对“基层机构纵容投机者”的第105条；针对在征收税款和其他付款时交付不足的人的第60条。第107条针对的是投机倒把的人；从1928年1月起，这一条就开始对“粮食持有者”也适用了，其中包括拒绝按明显压低的价格向收购部门交出粮食的农民生产者。对107条的新解释并没有必要的法律说明和限制，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在实际采用时做过宽的解释和限制，产生

了大量的“过火现象”。

党内刚刚才保护了新经济政策免受“左倾分子”的侵犯,对农民态度的这样急剧转变不可能不引起异议。1月14日又向地方上发出了斯大林的指令,要求“无论如何也要”完成粮食收购任务,也就是要不惜采用任何强制手段。这里也就把对农村的新政策(对新经济政策来说的新政策)的实质说清楚了:“共产党员中有许多人想,不能触动收购者和富农,因为这样会把中农吓跑。这是一些共产党员头脑中的所有腐朽思想中最腐朽的思想了。情况正好相反。为了恢复我们的价格政策和取得重大的转折,现在就应该打击收购者和富农,应该逮捕投机者、富农和破坏市场及政策的人。只有在这样的政策下,中农才能明白……投机者和富农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把自己的命运和投机者、富农的命运联在一起是危险的,他,中农,应该在工人阶级面前履行同盟者的义务。”¹⁴

如我们所见,十分明确地提出了富农不仅是粮食的持有者,而且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提出了要和他斗争的任务。1928年的粮食收购事实上开始了对富农的剥夺。最高领导成员作为劳动国防委员会和党中央委员会的粮食收购全权代表到地方上去,是在农村展开并从1928年初进入了“非常状态”阶段的悲剧历史上特殊的一页。在这些出差的过程中,斯大林和他最亲近的支持者向地方上的领导干部讲授了如何采用命令迫害的方法。

要想搞清楚将要到来的新时代和新的活动形式,有一个原则具有特殊意义,它是在斯大林在西伯利亚逗留期间通过的一个主要决定中表述出来的:“*在粮食收购战线上组织施压是党和苏维埃组织的突击任务,而施压本身要一直继续到收购任务的彻底完成*”¹⁵(斜体是作者所加——作者注)。

随着1928年2月1日通过这个提法,官方的语言,更不要说是党的宣传了,便有了一个固定的说法,叫做“粮食收购战线”,它准确地确定了国家和农民新的相互关系的性质:在完成上面下达的例行任务,也就是被统称为“过火行为”的所有一切时,把直接的恣意横行和暴力引进地方党的和苏维埃组织的实际活动中。1928年初,首先是在粮食收购的实际活动中,出现了一种说法,叫做“宁肯过头,不要不够”,它很快就成为了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的口头禅。

著名的1928年2月13日《致联共(布)所有组织的指令》称,“展开了的粮食收购运动已经取得了初步的决定性胜利”。这个指令有一个要求:“要毫不放松地继续强化粮食收购运动并争取不惜一切地(斜体是作者所加——作者)完成年度粮食收购计划。不惜一切地也就是说要不顾一切其他的任何考虑,在所有被称之为‘过火和歪曲’的情况面前也不止步。”这个要求把指令中的各个

“限制性”的规定,“坚决消除过火和扭曲的做法……”等等,都一笔勾销了。在中央的指令中写入了“在征购运动过程中”要进行清洗的要求:“从他们中间把异己分子和混进来的分子赶出去,用经受住了考验的党的工作人员和经过检验的非党工作人员取代他们”¹⁶,这样就大大加强了对地方上的党和苏维埃以及合作组织施加的压力。

讲到这里,新经济政策被断送的这段时期召开的联共(布)各次重要的全会之前的种种情况也就可以算是说完了。好像以后新经济政策何去何从是属于党的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事,至少是中央全会职权范围内的事了。可是,实际上,断送新经济政策是从总书记和一小撮和他志同道合的人做出的决定开始的,并没有党的高层机构的任何决定。斯大林的个人专政开始形成了。

考虑到政治成分在消灭新经济政策和确立新的斯大林模式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公布的联共(布)中央的各次全会的材料是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资料。正是在1928—1929年的各次全会上,新的方针从政治上得到了巩固,确立了И. В. 斯大林的政权,他打败了政治局里的对手——被称之为“右倾”首领的А. И. 李可夫、Н. И. 布哈林、М. П. 托姆斯基。

这个根本转折被斯大林称之为“伟大的转折”,而历史学家们则称它是“斯大林自上而下革命”的开始,它对我们国家的命运起了很大的作用。历史学家们通过研究国家经济和社会政治发展的具体事实,试图回答一个重大的问题:斯大林的这个胜利有多大的必然性,国家的发展有没有其他可以采用的方案?

对这个问题的争论是在两种极端的立场范围内展开的——一种立场是斯大林的胜利不可避免,另一种立场是存在着现实的“布哈林的”替代方案。这些争论再次证实了,进一步研究这一整套十分复杂的问题非常重要,研究新经济政策特别重要。¹⁷

大部分最著名的专著是在档案公布前写成的,主要的依据是已经公布的材料。这种情况并没有降低它们的学术意义,但是可以说现在有了可能在新的档案基础上富有成效地把研究工作继续下去。公布档案材料的积极过程应该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出版的材料也是其中的组成部分。

联共(布)各次全会的速记记录,特别是20年代的速记记录,是研究政治历史的极其重要的文献资料。由于除个别情况外,在党的其他领导机关——政治局、组织局、书记处,都没有做过速记,所以全会上的争论就成为为数不多的文献资料了,可以重现党的各个不同领导人的立场和政权最高层的斗争过程。由于这个原因,中央全会速记记录总是引起历史学家的极大关注。长年以来,能够看

到的只是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速记记录片段。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按涉及的情节公布了以真正的速记记录为基础的个别发言,积极讨论了出版全会文件多卷集的计划。正像其他许多事情一样,这些计划一直没有能得以实现,只是现在才逐渐地落实下来。

全会速记记录不仅是很有价值的科学文献资料,而且作为历史读起来也是很有意思的,在许多情况下是扣人心弦的,由于具有戏剧性的和炽热的感情而引人入胜。读起来恰巧对于我们又是一次“转折”,真正的转折,十分有教益。

*

*

*

本卷是 1928—1929 年联共(布)中央全会速记记录丛书的首卷。丛书共分五卷:

1928 年 4 月 6—11 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

1928 年 7 月 4—12 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会

1928 年 11 月 16—24 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会

1929 年 4 月 16—23 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

1929 年 11 月 10—17 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会

这里发表的联共(布)中央全会速记记录是一部相当复杂的文献资料。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由于速记记录的准备和加工经过了多道手续,结果是我们掌握着好几个版本:1)最原始的速记记录,是根据“话声”记录的,然后再解译出来;2)发言人修改过的速记记录;3)准备散发给党的各个组织的速记报告,是中央机关里的编辑委员会对作者提供的稿件进行了补充修改的稿子。¹⁸

既然从技术上难以恢复所有 3 种样式的速记记录,在准备公布时就出现了问题:以哪一种样式作基础?

最近这些年采用的公布全会速记记录办法,既有纯粹的速记报告,也有没有经过修改的速记记录,同时注明加入的修改。一些历史学家认为,理想的做法是使用原始的、没有经过修改的速记记录作基础。¹⁹该版本的编撰人认为,出版这种类型的文件采用一种办法不合适,因为各个不同时期的速记记录(这种速记已经进行了 70 年)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形成的性质上,都有很大的不同。公布 1928—1929 年的全会时,选择了速记报告,也就是最终形式的速记记录,作为基础。这样选择有几个原因。

第一,事前看到速记记录的时候,就这个时期的各次全会来说,原始的、根据

话声做的速记记录,由于有许多语法和意思方面的错误,许多地方是一些不连贯的、弄不明白的文字。而且常常不可能确定,速记记录上不清楚的地方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实际发言的情况(许多发言的人文化水平低,而且又是即兴发言),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技术原因引起的,例如听不清楚(原始的速记记录上不断会遇到注有“听不清楚”的空白)和速记员水平不高。看来这类原因都有。无论如何说,不能公布这样没有修改过的速记记录。发言人自己做出的也正是这样的修改,使得文字起码是可以看得懂的。

第二,通过对各种不同样式的文字进行比较可以看出,第二种(有作者修改的速记记录)和第三种(速记报告)样式之间实际上没有区别。这样,我们如果选择速记报告作为公布的基础,就有可能同时公布两种样式的速记记录了。同时,中央机关的编辑人员所做的不多的编辑修改就很容易在每页的注释里说明了。

就 1928—1929 年的各次全会的情况看,作者对原始速记记录所做的修改很大,实际上已经不可能完全把它恢复了: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是并列发表两种文稿。但是,既然作者的修改基本上是修辞性的和语法上的,也就没有必要完全考虑它了。同时,意思上的修改,也就是将文字写完或者删除有实质意义的段落,要全部考虑进去。新写进去的文字用加重号标明,删除的段落放在括号里恢复,作者在修改速记记录时强调的字特别区分出来。中括号表明的是编撰者加入的文字。

编撰者认为,通过这样的工作,做到了相当对应地恢复所有 3 种样式的速记记录。

作为出版基础的速记报告是单独成册印出散发给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每册都包括全会日程上的一个问题的材料。每一册在报告和讨论的速记记录后面,印有全会会议记录的节选和与该问题有关的附件。因为这次出版时所有各册都并在一起,编撰者对速记报告的材料做了一些调整安排。在报告和讨论速记记录后,按全会日程的所有各项内容的速记记录之后公布了全会会议的总记录(相应地,按各项做出的节选就不再公布了),然后是按记录规定的次序的所有决议,最后是速记报告的所有附件。

除附件外,编撰者在“补充材料”栏目下列入了新的材料。一般来说,这是补充全会速记记录的档案文件,对于评价全会本身和 20 世纪 20 年代末的党内斗争具有实质意义。

这次出版发行依据的是《历史文献出版规则》(莫斯科 1990 年版)。在最大